

追忆与反思：我的 2025 年

亲爱的自己：

今年我决定采取一种类书信的形式。我觉得我之前的几篇反思可能太注重文章的形式，舍不得讲废话抒情，难免有些端庄；将我的反思以与我自己对话的大白话的形式记录下来，甚至带有一点“想到哪就说到哪”的随意，可能会显得更亲切和自然一些。

在写作时，我还可能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切换，但他们指的都是我自己，这也是我要借书信的抬头来明确阅读对象的原因。这真是个小毛病！不然我总是顾虑读来会莫名其妙说教的感觉，那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

文章的长度意外地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本来只打算写 2 到 3 页。不过我想，可能也正是当前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正处在一个毕业不久，即将选择自己将来职业方向的岔口上，有许多话想向自己交代。因此，关于职业的部分，由于写着写着发现太长了，我干脆把那一部分汇总成了《我对职业选择的思考》一文，单独作为今年留下的一份特别的思考。

我的 2025 年

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除夕前，我都一直在忙碌申请国外研究生的事情。尽管春节后幸运地收到了部分院校的录取，但随之而来的六七月份全球赴美学签的停摆，令当时准备结束实习和收拾行囊的我，对今年可能无法顺利去读研大概有了一点心理准备。

诚然，我承认我带有一点惯性，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投入了一整个间隔年用以准备语言考试和申请学校，那么在收到录取后就应该及时返回学校才对，否则会与同龄人的节奏差距越拉越大；可随着这一年里我对想要从事的职业越来越确定，脑海里却也产生了另一个微弱的念头：既然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适合做什么，那么第一优先级就应该是马上动手做，或者至少先把它打造成一条可以稳定开展的副线，并从做中学习和弥补欠缺的技能，而未必要寄望于有了某个学位后，等别人招聘我去做。

但那仅是刹那念头，我并没有多想，甚至可以说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付诸实现的妄想；如果不是因为今年被迫延期开学，看着此时我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我完全没想到会将错就错地走到这一步。

.....

我记得是在八月底回复完学校的邮件，以确认接受延期入学的处理。此后我几乎没有犹豫——也是我觉得在情绪的后劲发作前不要让自己犹豫——就着手寻找工作室的租赁；在九月初安顿完基本的事情后，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一刻就是我把对职业的设想变成了我的工作，正式提上进程了。

接受今年无法开学的事实后，起初的一周我辗转难眠，夜里总有一种不适感时不时从我的胃里突然翻涌上来，让我不得不起身快步走向卫生间，扶着马桶干呕。我回想起过往两次相似的决策经历，一次是新冠疫情打乱了节奏，促成我决定留级一年准备转专业的考试，极度害怕自己因为热门专业竞争激烈而导致最后转专业失败；另一次便是不够成熟的我没能处理好在实验室中与合作者发生的矛盾，促成我决定放弃科研工作好好准备申请学校，但也极度害怕自己因为缺乏科研成果而导致最后发生全聚德的惨案（即一个学校的录取也没有收到）。

我短暂地回了一趟老家，和父母团聚，陪他们吃了晚餐，在饭桌上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尽量用平静的口吻告知他们我的决定和接下来一年的打算——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也知道我不能期待他们同意：

一位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后没有选择去工作、放着不受美签影响的录取院校不去，而是自己一个人独处一室钻研技术，在父母眼里很难不是一种不务正业、难以理喻，甚至是走火入魔的行为。

在此之前，我拿出了大学几年攒的所有零用钱，计算和分配好了自己未来十个月的潜在开销。我想，不论他们同不同意——我做好最坏的打算，设想父亲会大发雷霆地断掉我每个月的零钱来源，我也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不需要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给自己争取十个月的时间去启动这件事情。

如果十个月后我如期返回高校，那我利用我建立起来的副线，继续为我自己争取时间推进我的职业道路，也多少知道了我应该如何平衡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偏好；如果天有不测风云，十个月后我真的无缘出国，那最起码我也已经有了一点点职业的方向感，了解过行业内的猫腻，知道我可以尝试涉足哪个子领域、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

我也不奢望我短期内能找到薪水何等的工作。对我来说，一些名气上的东西我不再放到第一位；重要的是我需要逐渐有意识地培养甄别对方人品的基本能力，以及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这个领域踏实做事、值得彼此长期共事的伙伴。

.....

我告诉怒火中烧的父亲，我亏欠他一张机票、一笔学费；但剩下的事情，从学业到求职再到独居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全部处理好，不需要他和母亲再操半点心。

对金钱的思考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和我父亲吵架。这一两年以来，我觉得自己的脾气似乎暴躁了一些。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年轻气盛的信号。

父亲指责我，认为我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分得很清楚，越长大越成为一个性情淡薄的人；我回应他，正因为我长大了，要么我拿你的钱，留在你的视野里，听从你安排我的人生；要么我不拿你的钱，过辛苦的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我自己，换一个将来能独立决定我自己人生选择的底气。

我们父子之间当然没有真正所谓的争吵。我知道父亲不需要我因为花他的钱而“亏欠”他什么；我知道对于此刻没有工作的我而言，他依然会为我提供零钱；我也知道那些更大的隐形开销，譬如一线城市的房贷和将来几年的留学费用，又何尝是我一个刚入社会的毕业生有能力“还”得起的。

但是在我的心里，至少从延期开学的这一年起，在我的决定下所产生的关于工作室租金和个人生活开销的所有费用，我都已把它们当做是我向未来的自己借的——意味着未来有一天，我会连本带息地（以某种委婉的方式）还给我父亲。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君子一诺千金，我说到就做到。

我之所以要让自己这样想，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正在“烧”的是自己的钱，是为了时刻警惕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哪些地方上；我更希望借此向我自己表示决心，那就是从今年开始，我愿意为自己的决定全责承担一切后果和风险，但是，作为交换，我一定要拿回我关于自己人生的决策权。

.....

当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谈钱是一件俗气的事情；后来随着我临近毕业，从简陋的学生宿舍住进了精装的独立公寓，被告知了家里有一笔供我出国留学的冻结资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逐渐心痛而愧疚地意识到，此前的我是如何对钱的概念感到无知，我的父母是如何为了我的前程提前负担了太多太多。如果我愿意稍微计算一下房价的跌幅、平摊到每一天的留学费用，那些都是令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胆战心惊的数字。今天，我在一线城市过着与一个白领相当的生活，可我根本还没有能力靠自己创造出同等水平的财富。这样的感觉，时刻让我非常地恐惧与不安。

无奈地承认，人总在没有的时候渴望，却又很难真心珍惜那些轻易获得的东西；我更多是在努力引导自己对父亲在经济扶持上的感恩。因为我不知道他加过多少班，应过多少酬，挨过领导多少的冷眼和对他们说过多少（他告诉我）连他自己都觉得反胃的奉承话，最终才换来那些养家糊口的生意。

当家乡里的亲戚喝醉酒后指着我喊道“如果没有你父亲，你今天算个什么东西”时，我不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质上没有说错什么；我只是为我的父亲难过，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或官二代，我的脚下踩着的是父亲白手起家的血汗钱。二十年来，我们一家从摩托到轿车，从小房子到大房子，从小县城到（送我到）大城市，我理解他的不容易，也为我的无能而自责。

我从不在现实生活或网络上谈论自己的家庭背景，用今天的话来说，你总是会被贴上凡尔赛的标签。我见过已经衣食无忧、财力雄厚的同龄人，但我更共情在今天这个经济疲靡的时代，那些努力谋生的年轻人的艰难。就我个人而言，我其实宁愿我在人生的早年过得“颠沛流离”一些，可我无法不承认，我的父母多少托住了我的下限。我清醒地指出这一点，就是希望我自己一定要明白，有些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属于我的，看绝对的成就，是有失偏颇的；真正属于我的，是最后我如何借助我父母的力量，凭我自己的见识和能力，在相对于我原生家庭的起点上走得更高，飞得更远。

.....

正如我们或许听闻过的那些富有的人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借鉴和应该明白的是，钱所能带来的满足愉悦的边际效应，实际上，真的就是衰减得非常快的。到达一定的程度，钱就是一个数字。幸福归根到底，是那个我们都不太愿意听的鸡汤，那就是和个人的心态有关。

我父亲的格局忽大忽小。有时候，他会教导我要敢于花钱办大事；有时候，他又过分地节俭，以至于节俭到让我怀疑家里是否真的有财力支撑我在一线城市生活和去国外求学。不过，对于后者，我整体上还是认同的：正所谓由俭入奢易，而由奢入俭难。和母亲时不时地担心我零钱不够生活不同，一直以来，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费用，父亲从未下放过额外的资金到我的账户里让我自主支配。或许他并没有想得太多，但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培养量入为出的习惯，也就会回到了我在上一段开头所引入的观点：量入为出是培养一种控制边界尺度的智慧。我相信山珍海味、游山玩水的快乐其实不会太持久，长久作伴的幸福感反而恰恰源自于那些偶尔犒劳自己的美食、偶然驻足留念的美景。

今年五月份我在听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给毕业生的演讲时，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在理。他说，我们有一个衡量你是否富有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可是我们没有一个衡量你是否开心的“福布斯幸福排行榜”；即便真的有这样的排行榜存在，可以打赌的是，上面的人我们肯定也都不认识。

我一直觉得，虽然每个人生来不平等，但是上天还是留了一些可以相对公平去争取的东西。譬如你是否珍惜你的时间、你是否坚持爱惜和锻炼你的身体、你是否学习在与他人的相处中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我提到的事情，没有一样一定需要多么高的经济成本去支持，但也没有一样在我的亲身经历里，是我觉得简单的。实际上，没有长期的付出，即便是相对公平的东西，我们可能也抓不住。

我记得念小学时，当语文考卷上要我补全“钱可以买来 __ 却买不来 __ ”时，我和同学们不假思索地、信手拈来地就可以填上“钱可以买来手表，却买不来时间”，“钱可以买来药物，却买不来健康”，“钱可以买来豪宅，却买不来家庭”，“钱可以买来女人/男人，却买不来感情”……等我现在长大了，回过头来静下心仔细想想，我惊觉那一句句简朴的排比句里，蕴含了多么宝贵的领悟。

.....

我想把这些对金钱的思考引向我对富兰克林朴素理念的效仿：先赚钱，解决钱能解决的问题。

我不是指追求富贵，我是相信，经济独立让一个人在社会上给他/她自己带来尊严，相应地，人也会相对自由。同时，我也非常同意俗话说的，“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就像我在上面所感慨的，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是钱买不来、也解决不了的，它们需要长期的付出去争取和维护，不过，它们也相对是公平的。

在我所成长的家庭里，我所耳濡目染感受到的一点是，通过劳动赚钱，提高生活的品质和对生活的品味，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关乎个人的理想、对社会的使命，命里无时不去强求，但是始终没有忘记、一直在路上，也就于心无愧了。父亲和我说得最多的两句教诲，一句是“人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另一句是“人各有志，但最重要的是懂得知足常乐”。

我以赚钱为目标，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务实的人；但赚不赚钱，我明白那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假如我有幸设想有一天我不再需要为谋生而忧愁时，那我想，钱，对我而言的其中一种意义，就是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杠杆，让我能够去帮助那些比我聪明的人，去资助那些对社会有益的项目。

有时我会想，富兰克林早年因为喜欢诗词而选择留在报社工作时，是否想过，在那个纸媒盛行的年代，他在报社的人脉和积累有一天会成为他思想布道和从政仕途无可替代的推力？我看到他自早年便热衷为公益事业勤勤勉勉——让我觉得很多事其实有心总是可以做，等有钱了人未必再有心了。

最后，作为一名刚刚走出大学（可能还要继续走入大学读研）的毕业生，我想说，大学没有教给我如何“赚钱”的能力（因为那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学的义务）；大学教给我的是如何“挣钱”的技能，以被用于为公司和企业赚钱的同时，让我得以谋生。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学教育的意义之一，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教会一个年轻人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那么，对于那些志不在解决科学难题的年轻人来说，是否也可以把赚钱本身当做一种社会难题去系统地求解？

对教育的反思

我离自己的高考已经过去六年了，曾经我一直觉得相关的话题羞于启齿；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间我也已大学毕业一年，我想现在或许我可以比较公允地评价自己的过去了。这一章节后半部分的内容，也算是对《我的五年大学之路反思》的一种补充。

高考结束后，我逃避去想象和接受我是班级里的倒数这一事实。平均水平的同学们都去了省内外的重点大学，当时我感到颜面扫地，不愿再和同学们联系，退出了班级的群聊。那个时候的我，除了一位落魄的高考生，还是一位被我的数学老师（礼貌地）告知不适合学习理工科的自卑高中生——这其实是我大学最初选择了设计类专业的深层原因，是一种我当时潜意识里对学习理工的逃避。

我记得在当时，高考的前夕，课程模式已经切换为停课自学，大家都有自己的科目要复习和冲刺，只有我偷偷地跑到了高中楼对面那些低年级学生清空的教室里。坐在空荡荡的教室，我盯着头顶的摇摇曳曳的电扇，天气炎热而慵懒，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在思考还是在发愣。

我想，似乎别人的高中都是在高度紧张下争分夺秒地做题，而我的高中却是一种表面紧张，但实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假象：高中三年，我没有去思考过高考的重要性，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想读什么专业，更不知道什么是985/211重点大学的称谓、以及在现实社会中求职的艰难与残酷。

高考的那一天，我在各个科目上不同程度地交了白卷，一方面是高中时的我确实不理解做题这项任务（或者说筛选机制），以至于我在文理分流后无心向学，无力求解；另一方面是，我当时的状态很糟糕——当我在高考前一个月萌生了复读的念头后，我其实从心理上已经退缩了，尽管我当时再怎么鼓励我自己，实际上我已经无法在考场上专注……

我每次想到这里——甚至总能回想起当时茫然地注视额头前方那轮指针滴答的挂钟——真的觉得心有余悸，也真的觉得羞耻无比！愤恨自己当时怎么可以那么、那么地敷衍自己的未来！可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进入高中后，我不知道怎么学习，已逐渐被破罐子破碎的心态所吞噬。

走出考场的那个下午，我记得我的班主任与每一位“凯旋”的同学击掌、我记得父亲朝我快步走来并以拥抱迎接、我记得母亲给我买了麦当劳的汉堡充饥。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在车上的后排座位上一边吃，眼泪则一边大颗大颗地往下掉。那天晚上，我借着下楼散步的理由，心急火燎地致电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复读机构，也全然没想过自己会不会上当受骗……

后来，令这件事情戛然而止的是，父母坚决不能接受我复读的想法，他们不希望我养成一遇到什么问题就首先寻找退路的习惯。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然而现在回想，我觉得父母是对的。

.....

在我决定是否写下上面这几段叙事的时候，我非常地犹豫，因为我知道我在面对应试教育带给我的阴影。在中国，客观地承认你在高考上的失败，在一些人眼里，等同于承认你在智商上的昏庸。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几乎我身边所有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高考失利；但今天坦诚来讲，我想我其实没有资格说失利。我当时悟性不佳，即便让我复读一年，其实也未必能有质的提升；虽然做题不一定是衡量聪明与否的唯一方式，但当我后来见过很多的确非常聪颖的人后，我也已经很坦然地接受了我算不上聪明这一不争的事实；唯独让我真正觉得惋惜的一点，是我在事后仍然缺乏对自己的引导、仍然没有很好的悟性。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寄语于我自己一句话，我不会选择回到高中那个时候，告诉他“高考考上名牌大学，对后面找工作作为敲门砖如何重要”，或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学习方式是低效的。在一种筛选机制下，时间有限，你尽量不要把求知与解题混为一谈”云云此类的话。我不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的他，很难真正领悟这些东西。相反，我更愿意回到那个他勉强接受了一个自我感觉不理想的结果、从而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正如我在《我的五年大学之路反思》中感慨过的那样，大学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在可以尽人事的方面，对未来做好应对和规划。我会告诉他的是，把大学仅仅当做是一种通过保研或考研去到更好的平台，从而完成对高考的一种“弥补”；或者盲目地追求成绩、荣誉、和所谓的科研成果，都是对教育一种比较片面的观点。只有一点你应该牢牢记住、慢慢琢磨：那就是作为学生的你，拥有一样最宝贵的东西：你的时间和青春。小时候，你觉得老师们说“年轻就是最好的资本”是一句鸡汤；现在我长大了，我才真正明白，当你越是年轻，“花时间去琢磨如何把你的时间和青春投入到什么样的事情上去试错”这件事情，就越是有价值——甚至我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因为今天我进入社会后，我终于意识到很多东西（差距）是你和别人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可比性的。教育，或者说学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相对公平的方式所达到的）有限的弥补，而比读书复杂和需要考虑的问题，仍然有着太多太多。学历（包括你的原生家庭），撑住你的下限；年轻，延缓社会对你的宽容；而关乎上限的东西，靠你的认知、见识，靠你的时运、靠贵人的相助。

人最终要把比较放（回）到自己身上来，关注在已有的基础上，相对于自己能走多远。

如果那时，还不到20岁的我能多少懂得今天的一些道理，我觉得短短几年的积累下来也都可能会不一样。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去为当时的无知辩护，就像未来的我，也会看到我今天的无知。人需要躬行一些事情，需要自己总结经验，需要走向社会历练——甚至需要被算计和伤害过，才会在回望身处象牙塔的时候，明白一些朴素的道理。

我追忆过去，最终为的是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朝前看。

.....

在我写《我的五年大学之路反思》时，我记得我是以转专业的经历来引出我的过去的。这件事情的导火线是，我当时看到指导老师对着我的设计图纸全盘否定，让我觉得建筑设计的审美带有主观性，甚至觉得艺术如此“不讲道理”，所以“一气之下”转了专业——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说回来，现在让我重新审视这个观点，我会说，其实任何东西做到卓越时，都是一种主观艺术。正如许多大师说过的，以美为导向。很多时候，拥有好的品味和直觉胜过一切，剩下的，该来自然会来。

在大学时期接触一样专业很“重要”。重要的地方不在于你在这个专业上比别人起步得有多早，重要的地方在于那个时候的你，是一张白纸，因此学习一样新专业是一个“被植入”新知识的（痛苦）过程。就像一位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以后继续保持学习时，不会害怕底层代码、不会害怕数学公式，而会觉得那是一种亲切而高效的“语言”。我觉得这种对学科“语言”天然的青睐是大学对学生最重要的栽培之一，这是一种在（工作之前）思维方式慢慢固化之前对大脑的“初始化”。

在大学时期接触一样专业也“不重要”。大学其实未必比得上那些培训的课程，甚至非常多的习得的技能一毕业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大学更多地是在于掌握“如何学习新知识”这项本领本身。所以，未必需要一个严格的“专业培养计划”，只要有兴趣，从任何一个不错的起点开始都可以：遵循第一性原理，不要过分转牛角尖、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永远把提出问题放在解决问题之前，那么我相信最后总会殊途同归的。更何况，从以前的互联网在线课堂，到今天的AI对话，（广义）专业信息获取的门槛一直在降低——不过也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斟酌：大学教授会批评学生不经过大脑思考就提出“懒惰的”问题，但是AI的出现可能在加剧这种“坏习惯”。或许，信息获取的能力变强了，可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却未必跟得上。

.....

我当时参与了科学研究，还有一件比较现实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客观地拿出来讨论一下。

在公开场合，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说自己研究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在我私下观察时，我没有觉得谁（包括我自己）是真的觉得那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反而听到最多的，是大家调侃彼此在“灌水”和“搬砖”；是大家调侃谁又因为中了哪篇顶会而“衣食无忧”。我觉得这可能会对那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学生形成一种误导，神话和高尚化了学术圈。事实上，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通过一篇或数篇顶会获得了提高底薪的工作，而在业界中再也用不到他们做的研究，是一种常态。

后来我在反省，“面子”上的东西固然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以后不打算在学术界工作的学生来说，科学研究至少要能教会他们一些“里子”上的东西。例如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会辩证地看待观点、有论据地讲话和有逻辑地写作、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理解一个经验性结论和它背后的假设之间的联系等等，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或者不愁经济不愁生活给了你做研究的闲情逸致，或者你的研究真正在你感兴趣的问题上落地而带给你实在的收益。要想清楚，你是哪种情况。

可遗憾的就是，没有人会教我们这些东西；或者说不是不愿意教，至少在我读大学时，是因为没有义务要教学生这些东西。一方面，这些不是靠课堂讲授就可以轻易传授的东西；另一方面，许多涉及研究层面的东西是没有、也不知道是对是错的，因而不适合被指标量化——既然不可以被量化以分出一个“排名”出来，作为学生的我们，就难免失去了动力（或者说是惯性）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重研究、轻课业，这种清高的心态使我在毕业后申请研究生项目时吃了很多亏，我是后悔的；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认为它需要一种更加聪明的方式去引导。

.....
申请季结束后，我本想借机在去年把那段经历写入反思；后来我一直很忙，也逐渐意识到，申请过程中的欢喜忧愁只是漫漫长路上的小插曲。我就在下面这里寥寥几笔带过了。

我当时申请了全球各地差不多有 50 个计算机类的研究生项目，那是个不小的工作量。我还非常记得我当时的心态：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只要最后清单上能有任何一所学校录取我，我都会去读。

如今我在思考，仅仅以研究生为例，在国内，工作后再去“考”研究生，的确是难免形成割裂的，所以教育被迫要完成得越连贯越好，但这也一定程度上过早地牺牲了探索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在国外，教育则和产业、校友联系得紧密得多。

教育像是投资，让一个人随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最大化专业领域的迁移或晋升的可能性；教育也更像是背书：如果你本身有能力，背书放大你的能力；如果你名不副其实，你削弱一个品牌常年积攒下来的口碑——当这种现象出现得太多，就很容易在大洋彼岸引起短期内不可逆的大众偏见，甚至拖累你的校友。从这个角度讲，我多少能够理解招生官所设置的那些门槛背后的源由。

我觉得一次申请季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切身感受到在不同角度下对教育的一种更客观的理解。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当初申请时的心态，我觉得，可以理解那时的焦虑；但是我想对自己说（不仅是针对过去的院校申请，也是用来类比对未来的求职申请）：比起沉溺或纠结于录取与否的欢喜忧愁，更加重要的是首先弄清楚教育的“时机”到底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你对“高维”的东西了解越多，你的选择其实就相对越少；从这个角度上讲，你也就节省了精力，弱化了焦虑。

除此之外，我当时还打算写下一些诸如语言考试的心得体会，但现在想想，也觉得可能不太应景。不过我觉得，可以试着说一点点比较“宏观”的体会。

好几年前，我是一个恨不得把我身边所有的一切，包括电子设备的系统，全部都设置成英文模式的人。后来随着我逐渐对一门语言稍微了解得多一些，我也逐渐对其背后的文化体会得更多一些。我开始明白，语言不止于生活，实际上很多类似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分庭抗礼——小到某种圈子，大到国家政治——说一些只有你我才能意会的话，正是从语言（造词）开始的。

我反而对语言产生了敬畏：因为我意识到在我的情感和思考的最深处，母语永远无法被取代；我意识到语言越来越像是一门宗教信仰，而你是不是只在你的“主”强大的时候才选择爱她呢？这似乎谈的有些远……话说回来，我还仍然保持着每天自发学习英语的习惯，只是早已不再为了考试或留学。英语成为了我对自己的终身教育，对大脑的训练（我非语言学专家，但我切身体会到，虽然英语臃肿，但其窄内涵的特性能精确地抽象概念，包括缩写也是），和让我更客观去认识世界的媒介。

.....

在收到录取通知后，父母很高兴，那天晚上母亲还喝了一点白葡萄酒，有些微醺，他们对我寄语了许多。其实我已经有些忘记了那天晚上父母和我说过话，我只记得当时我对自己的内心独白：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二两位会为我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而发自内心开心的人。

我结合吴军博士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看法，来结束我对这一章的反思。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刻意将自己的学历或学校作为谈资：英雄不问出处，我们完全乐意于不耻下问；但是漫漫职业道路上，我们的气质已经继承了一所学校的精神和校训，我们的作风已经不经意间成为了对一所学校的办校理念最好的佐证——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人生感悟

我不觉得十年很短暂，但也不觉得十年很漫长。

十年以前，我刚刚进入高中，略显中二地在食堂和我的同学唠嗑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少年时光迷惘而青涩，从未思虑将来人生；再回首，少年已一去不复返。

十年以后，在我的而立之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父母会退休，二老的身体会日渐虚弱；是我将度过我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光，中年的小疾病会开始来找我的麻烦；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我要在一个伦理和生理的年龄期限下，考虑组建我的家庭；是我要平衡当我不再只是考虑我自己时，我该如何掌舵我的职业道路，不因别人的倒闭而倒闭，不因别人的破产而破产。

那时，我还未必能在社会上站得稳脚，但那不意味着我可以停止追问自己，应该要去做哪一件或哪几件能够让我在十年后复利的事情——那会成为我在这个社会上的原始积累，是我拿来和别人做利益置换，以及保护我自己和照顾我的家人的筹码。它不是我的理想，它是我的目标，是我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和实现的事情。

我脑海中的肖像则是一个缄默且儒雅，冷静且沉着的男人；是一个独挡一面，不卑不亢的男人；是一个修身养性，外圆内方的男人：拥有自己性格的底色，又有如同变色龙一般的适应力。

今天我所付诸的所有努力，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建设这个肖像并向他靠拢，甚至成为他。最终，我向往知行合一的智慧，心口如一的宽容，从容而优雅地老去。

.....

我做不到像乔布斯那样，每日早晨面对镜子，拷问自己向死而生的问题，那样未免太过沉重；但我的确，偶尔，会做这样一个关于死亡的思想实验：设想当我已经只身一人，濒临垂暮，在我面前有一颗可以结束我生命的死亡按钮；出于什么样的心境，我愿意在弹指之间接受我自己的离开？

是那一刻我在意我的财富吗？一定不是，我知道虽然这是我生前打拼的东西，但是我也清楚这是我死后带不走一分一毫的东西；那么，是那一刻我在意我的事业吗？嗯..... 应该也不是。我有点犹豫，是因为我猜测自己会是一个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的人；然而很快我能想明白，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总会有人，为了某些我们都认为有所裨益的福祉而勤勉一生。

那我到底在意什么呢？

我在意我的父母。在我送走他们之前，我是否尽力陪他们度过了一个还算不太孤独的晚年；如果我有能力步入婚姻，我在意我的太太。在我看来，那关乎于一种血缘之外的信任与容纳，是一个无比艰辛的终身课题，不单单是契约下的财产绑定与再分配；如果我有能力培养后代，我在意我的孩子。比起他/她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更在意的是他/她是否过得还算体面、健康、和开心。比起有多少财富可以继承，我更在意的是我们是否教会了他/她掌握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顽强生存下来的能力。

如果在那一念之间，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的遗憾，那我想我真的可以欣然而潇洒地离去。

我为什么描写这个思想实验呢？

其实我算是一个很自我的人。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似乎纯粹的“自我”意识更多地是让我在按下那个死亡按钮之前，感到一丝踌躇和贪恋，感到一点莫名的恐惧。不记得是哪一位思想家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对肉身消亡的恐惧，来源于我们站在“有”的视角，却试图理解“无”的概念。

第一次读到那句话时，不太理解其中的道理；但在这个语境下，我似乎有些眉目：“自我”是一种很强烈的“有”的感知，而我们与世界上的他人所产生的联结，稀释了这种感觉。我们对意义的感知，从“自己”延展到了“他人”；从一种为自己的生存和牟利，变成了一种为他人的牺牲和给予。

这是一种基因层次下所驱动的生物本能吗？我觉得一半是，而另一半，则可能源于人本是一种情感非常复杂的动物。我们开始感到舍得，对爱人离散和亲人离世的痛楚与释怀，构成了人生的多层体验；我们也开始感到欣慰，我们游离在大千世界的沉思，回到了与那双明眸的四目相对之中。拥有那双明眸的孩童，身上流淌着你们的血夜。忽尔间，你觉得那是你们在浩渺宇宙中生命微弱的延续。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过，我同意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可以源自于我们与他人的联结。那么，就像我们可以接受人终有一死，我们应该也要接受其实人在内心深处一定是孤独的。只不过是，人生这一路如果有人可陪、如果有事可做，会淡化和让你忘记这份孤独。

没有谁能够救赎你，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人生，只有你能救赎你自己；把许多事情看成是一种给予，而不是占有，许多事情会容易释怀一些。你如何给予？你首先要拥有。你如何拥有？你首先要自强。(you need to have it before you give it).

.....

任何扭曲了自然的过程，从而快速满足对暴富、权力、女色欲望的事物，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把你引向极乐后的虚无为代价，请不要试图驾驭虚无——至少我很清楚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是一个能够操纵欲望张力的男人，我也志不在“成大事”；我是一个有些崇尚禁欲主义的男人，所以我志在“成小事”。

.....

我每天都需要承受一点痛苦和惆怅。

它们不来源于焦虑，我其实相对不那么焦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不怀疑自己的执行力；痛苦和惆怅来源于我对时间流逝的恐惧。每一天我照镜子的时候，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不过，我的皱纹在以我肉眼觉察不出的速度爬上我的脸庞，我的青春正在一天又一天地贬值。

人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可能只需要一年，但是检验这个决策在刨除运气的成分后最终是否行得通、成败与否，可能要付出比想象中漫长得多得多的时光，而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可以奋斗？

零碎的思考 · 心智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不加展开地留下过去几年里我零散记录的思考。他们都是一个或一组短句——如同许多似曾相识的道理那样。但是即便一个观点听上去再有道理，我也不会在我的反思里重复别人的观点；只有那些被我在过往经历中验证过的，或自己逐渐领悟出来的，我才会把它们写在下面。

而心智模型，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只是一个模型。它是我对人或事在有限时间内的“一阶近似”——它们构成了我在生活中的直觉、形成了我做事的方法论。但是，它们未必是充分客观的，更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

- 拥有自己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才是一样普适经验中最重要的变量。
- 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东西。即便眼见为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宁愿只相信一半你所看到的东西。
- 富兰克林说过，在社会中与人交往，默许你懂得防备：他轻易承诺，他无意履行。
- 别人夸赞你的漂亮话，请把它削弱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你会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别人委婉的指责，请把它放大到原来的三倍，你有可能真正辨认出你的不足。
- 越是一件你明明觉得重要却检索不到信息的事情，越是这件事情可能值得做的信号；越是有多如牛毛的攻略指导你如何复制一条成功的路线，请三思而后行。
- 反感你的人，在你没有把事情做成之前，觉得你现在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请别气馁，看开一点；看戏的人，在你把事情做成之后，觉得你之前做什么都是在对成功的铺垫——请务必小心这种造神一般的赞美，因为人最容易掉进的陷阱之一，就是合理化和美化自己过去做出的选择。
- 下木总统弗兰克告诉我们，虚伪是通往强权的必经之路，而自古权贵不分家。

- 把自己的长处，苛求到远高于平均水平；把其他事情，耐心地做到比平均水平高一点点。全部组合起来，整体的效果往往会觉得出奇地好。
- 道听途说得到一个道理，到我们通过自己的经历领悟到类似的道理，再到我们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熟练地应用这样的道理，是三码事情，而且每一个之间，都还有着很大很大的距离。
- 信息不等同于真相。如果来者不拒、逆来顺受，那么算法要么让你暴露于更多你觉得舒服的观点，让你在无意识中强化自己的偏见；要么在你阶层之上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操纵舆论，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在舆论成型之后，事实还重要吗？
- 在我的国家里，自发的共识是难以形成的，因为它们要么被扼制在摇篮中，要么被其他版本的叙事所统领和覆盖掉。我不是为了谈论政治，我是警惕一种因为不够客观而带来的自鸣得意。
- 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是现在的模样，大家都是长大成人。就像歌手李健说的那样，别觉得自己那么伟大，但也别觉得自己那么渺小；有多少的成就，背后就有多少看不见的心酸。这种心态既是我用来提醒自己，面对那些比我位高权重的人，保持尊重而不失尊严；也是我用来提醒自己，面对那些比我年轻的人，虚心向他们学习，因为未来终究是他们的。
- I am rooted, but I flowed. 这是我从我的一位好朋友身上学到的智慧。最初我误以为这只是表达一种对自由不羁的渴望；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在接纳自己已经定形的意识形态下，仍然有能力对不同于自己的人或事保持宽容。
- 我们有两只耳朵，一个嘴巴：少谈论自己，多倾听别人；重视如何表达，讲话是有门道的。
- 如果你解决不了一件事情，解决它的原因。如果你解决不了它的原因，解决它的原因的原因；有时，我惊讶于一件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并不是非得要以一种争锋相对的方式去解决。
- 我觉得一个值得的项目最好包含两个部分，一样偏向工程，考验你的细心和耐心；一样偏向探索，考验你的状态和灵感——但是说到底，状态和灵感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源于你是否重视基础。在成果方面也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层面是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做给别人看的（包装），另一个层面是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做给自己看的（负责）。这两个层面有时有着很强的不对称性。

结束语

一直到过去的两三年里，我才慢慢有意识地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在我过去的二十年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两三年里那样，能让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自我意识的存在。我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渴望独立；我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渴望自由；我也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明白独立和自由的背后，一个人所需要承担的代价和责任。

眼看着 2025 年即将成为过去，我也将迎来自己的 25 岁。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一无所有。

也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正拥有着最需要我去用心感受到和好好珍惜的东西：我有着大量的时间；我有着每天用不完的体力和精力；如果我的家庭没有太大的变故，如果我的身体一向不错——那么我姑且认为我还有一颗可以十年饮冰，卧薪尝胆的心。

陈凌志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于广州